

论金德珪《新安文粹》的编刻过程及典型意义*

——基于地域文学生态链生成与演进的个案研究

谷维佳

提 要：明天顺四年（1460）冬刻成之《新安文粹》15卷，是在金德珪原集《新安文集》40卷基础上，由其侄苏大裁汰重订，更名付梓而成，现存天顺四年苏大重订本，藏国家图书馆。该本有前序两篇，后序及跋3篇，叙跋者根据各自身份不同，行文中有明显的身份意识表达，基于该本“选而再选”之二选重订的特殊性，序跋者对“选者尤难”的体悟尤为深刻。该本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前后相续而出，后者在编选契机上受该书之影响，既有对其裁汰过多的不满，也有增益垂范之意。从《新安文集》到《新安文粹》再到《新安文献志》，自然形成一个地域性文献总集编纂的历时性文学生态链，《新安文粹》作为中间环节，上承下启，其编选刊刻过程具有多方面的典型意义。另外，《四库总目提要》对该书著录颇有语焉不详及舛误之处，亦需细加辨析。

关键词：金德珪 苏大 程敏政 《新安文集》《新安文粹》《新安文献志》

徽州（即古新安郡）既是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的祖籍所在，也是徽学和理学文脉的发源传承之地，为保存流传地域文脉，明代徽州地区的编书刻书活动一直传承不衰，其中从金德珪编《新安文集》，到苏大二次重订更名为《新安文粹》^①，再到程敏政之《新安文献志》，自然形成地域文学生态链生成演进之典型个案，《新安文粹》作为中间环节，其编刻过程具有多方面典型意义。

明徽州府休宁人金德珪，字仁本，历时30余年，编成《新安文集》40卷，未刊而其人没，后经由其侄苏大删汰重订，更名为《新安文粹》，并付梓刊刻，弘治《徽州府志》载：“国朝有金德珪《新安文集》，苏大《新安文粹》，及各名家多有全集行于世。”^②把编者与重订者，原题与新题各自分列并录，是比较清晰严谨的表述，惜未阐明二者之关系。金德珪原集《新安文集》已佚，《四库存目丛书》载现存天顺四年苏大重订本《新安文粹》，版刻整饬精美，序跋内容完整，编纂成书过程清晰，是对保存流传新安地方文脉有很大价值的地域性诗文集选本。《新安文粹》的编刻过程坎坷，序跋者与重订者之间关系复杂，基于序跋者身份视角不同，对此书成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古文选本整理及研究”（项目编号：17ZDA247）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明史·艺文志》又载“张阳《新安文粹》15卷”，《明史》卷99《志第七十五·艺文四》，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496页。然嘉靖《徽州府志》“隐逸”卷之19“孙阳”条下却又载“《新安文粹》”，汪尚宁纂，河东序修：《徽州府志》，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本，第217页。同见康熙《徽州府志》卷之13“风雅”条，赵起士纂，丁廷榘修：康熙《徽州府志》，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刊本，第14页。《千顷堂书目》卷31载“张阳、苏大《新安文粹》十五卷”（民国适园丛书本，第15页）似认为二人皆各自编有同名同卷数之《新安文粹》。清人汪辉祖《九史同姓名略》卷22（清乾隆刻本，第7页）“张阳”条记载了两个张阳：“张阳，一见《明史》卷十六武宗纪正德十四年太监，一见《明史》十九艺文志撰《新安文粹》十五卷”。张阳（或孙阳）本《新安文粹》今不得见，史料文献中偶有提及者，不仅编者名姓不一，且记载粗略，不得见其大概。

② 彭泽、汪舜民纂修：弘治《徽州府志》卷之11，明弘治刻本，第1页。

书过程、文献价值与编刻意义各自有不同阐发，二次重选的特殊性带来的“选者尤难”的体会和强调尤为突出，因此，从地域性选本角度来考察其编刻过程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作为方域类地方总集，其成书明显早于更具盛名的程敏政所编之《新安文献志》，二者前后相续，均为新安郡之文章总集，虽编选体例有别，但仍有一定相似之处，很难说后者之编刊没有受到前者的启发和影响，且更有精进之意。然目前学界对《新安文献志》的关注远超《新安文粹》^①，且《四库总目提要》对后者语焉不详，还有舛误之处，亦需细加辨析。

一 原编与重订：从《新安文集》到《新安文粹》

《新安文集》最初编者金德珰，金氏乃新安地区家贫好学儒士之典范：“金德珰，字仁本，休宁汪坑桥人，家世业儒，至德珰而贫，好学，手自抄录，箱帙满家。虽饥寒困苦，手不释卷，六经三传，诸史百氏，山经地志，医卜神仙佛道之书，靡不研究，世家士族争为西席，子弟经其训诲，悉有礼度……有《新安文集》四十卷、《道统源流》、《程朱氏录小四书》、《音释》，卒年七十二。”^②休宁县今位于安徽省最南端，隶属安徽省黄山市，古属新安郡。金德珰虽家贫不仕，却用心苦学，博览群书，在当地有儒师之风范，颇有著述。又据天顺二年（1458）苏大所作《新安文粹后序》，可考其生卒年：“……拔其尤者……通得若干篇，庚午夏值回禄之灾，兹事未遑，明年仁本没，每思然诺，茗员逋钜之矣焉。岁丁丑，圣天子复登大宝，改元天顺，次见基早世，嗟悼之余……”^③改元天顺之前为景泰，景泰庚午即景泰元年（1450），仁本于第二年去世，即景泰辛未年，其卒年七十二岁，则金德珰当生于洪武十三年（1380），卒于景泰二年。

重订者苏大，字景元，乃金德珰之内侄，历叙重订《新安文粹》之始末缘由，即由其姑夫金德珰积30余年之功力所集《新安文集》40卷而来，“族姑夫金仁本道近搜远，采积三十余年，次为四十卷，名曰《新安文集》……乃取旧选，重加订正，并平日耳闻目见，与时文之可取者，悉类入……总十五卷，题曰《新安文粹》，铍梓以传”^④。苏大之重订，主要侧重三个方面：一是裁汰繁芜，由40卷删减为15卷；二是加入自己的诗文集1卷，附录于末，“窃效太史公序《史记》，后自为一卷，或因以质诸四方君子，幸莫大焉”^⑤；三是重新更名为《新安文粹》。相较于《新安文集》而言，“粹”者当有精选其尤者之意，苏大重订之用心也被其友人明确点出：“今予契友苏景元，以其乡先生金仁本集录吾郡累代名儒所著诗文，复加采择，拔其尤者，铍梓以传，名曰《新安文粹》……予交景元几四十年，知其用心之勤，克成是集之美。”^⑥程敏政

① 可参看者有张小明：《建构地域文化自信：〈新安文献志〉的范式意义》，《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4期；何庆善：《论〈新安文献志〉的文献价值》，《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吴有祥：《〈新安文献志〉编刻始末考》，《黄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刘琴丽：《〈新安文献志〉所收〈程岩功德碑〉辨伪》，《安徽史学》2016年第5期。这些文章对《新安文献志》所彰显的地域文化意义和文献价值，到编刻始末，具体文本等皆有所发明，甚至还有从经济史角度着眼者，如顾成瑞：《唐代蠲免事务管理探微——基于对〈新安文献志〉所录唐户部蠲牒的考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② 见《金德珰传》，《新安文粹》第15卷，明天顺四年刻本，第16页。又，同《金仁本（德珰）传》，《新安文献志》卷95下，明弘治十年（1497）祁司员、彭哲等刻本，第10页。

③ 苏大：《新安文粹后序》，明天顺四年刻本，页码损毁缺失。

④ 苏大：《新安文粹后序》，明天顺四年刻本，页码损毁缺失。

⑤ 苏大：《新安文粹后序》，明天顺四年刻本，页码损毁缺失。

⑥ 张逵：《中山书塾记跋后》，《新安文粹》第14卷“补遗”，明天顺四年刻本，第10页。

《新安文献志》亦载有此事：“苏景元（大），休宁城南人，号钝斋，所著有《瓮天集》，及编《新安文粹》十五卷，《皇明正音》十卷。”^①可见程敏政编辑《新安文献志》时当知苏大重订本《新安文粹》已刊。

《新安文粹》的刊刻时间，可由序跋者之著录得知。程富和苏大本人的序跋作于天顺二年，孙遇的序作于天顺三年（1459），末又有天顺四年交付版刻之时苏大所记捐资者之姓名，由序跋者所著之时间，亦可知《新安文粹》当于天顺四年冬付梓刊刻而成，此时距离金德珙去世已近十年。

参与《新安文粹》刊刻之刻工，主要为当地传统刻书家黄氏家族之黄文敬、黄文斌、黄文善。“黄文敬（1439—1507），明天顺间歙县虬村人，刻字工人，字拙庵。参加刻过《新安文粹》。”^②“黄文斌，明天顺间歙县虬村人，刻字工人。参加刻过《新安文粹》。”^③“黄文善（1438—1482），明天顺间歙县虬村人，刻字工人，字一愚。参加刻过《新安文粹》。”^④在现存天顺四年《新安文粹》中，程富序跋末左下角有“文善刊”字样，苏大后跋末亦有“歙西黄文敬刊”落款。

以上，《新安文粹》之成书过程大致为：新安休宁人金德珙自永乐十九年（1421）前后开始，远近搜求，积30余年之功，于景泰元年编辑而成《新安文集》40卷，手录之，未及付梓刊刻，越明年，即景泰辛未年卒。去世之时，嘱托其同郡内侄苏大代为付梓，苏大同为休宁人，出于亲族血缘关系及重诺守信的原因，悲悼之际，接手此事，却并未按金氏原本原貌刊刻，而是汰繁取尤，且仿太史公《史记》之例，加入了自己的文集，自为1卷，附录于后，重订刊刻而成，并更名为《新安文粹》，是书成于天顺三年，并于次年天顺四年付梓，同年冬月终于克成，见诸世人，此时距金德珙去世已经九年。

未刊而佚的《新安文集》能借由二选重订之《新安文粹》基本得以保存，这与金德珙和苏大之间的同郡姑侄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客观上显示了地域性文学家族的强大凝聚力和学脉借助血脉传承的延续性。但重订者苏大不但借由“精粹”之名对金氏原集版本大加裁汰，使金氏原本不传，且又秉持私心，附录自己文集于后，也引起时人之不满，为程敏政《新安文献志》的编辑埋下了伏笔。

二 序跋者身份意识的表达与“二选尤难”的体悟

作为“二选重订”之版本，《新安文粹》自有其特殊性。其序跋共有5篇，除因刊刻原因偶有页角脱字外，整体保存较为完整。前序2篇，其一为天顺三年秋九月直隶徽州广知府福山孙遇所作，其二为天顺二年夏五月同郡人程富撰。又有后叙跋者3篇，分别为当地人汪敬思作后跋1篇，歙邑棠川鲍宁后叙1篇，及苏大本人于天顺二年自作后序1篇，另未附助刊者姓名、所捐费用，及苏大天顺四年冬所写“识别”数句。

《新安文粹》序跋之次序排列，并非按作序之时间先后，前序首以徽州广知府孙遇序，作于天顺三年九月，当是考虑到其“赐进士第，食正三品俸，直隶徽州广知府”的职官威望，及文集编订者对职守本郡长官尊重之意；次以同郡人程富之序，除其同为正三品“嘉议大夫，督察

① 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上）》，第28页。

② 瞿冕良编：《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68页。

③ 瞿冕良编：《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768—769页。

④ 瞿冕良编：《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769页。

院右副都御使”的职务外，程富天顺二年作序时已70岁高龄，并于本年去世，或有尊其年高德劭之意。后跋先以同郡人汪敬思跋、鲍宁叙，末附苏大本人后序，乃自谦之意。

在这5篇前后序跋中，序跋者的身份意识十分强烈，其序跋文之思想表达与其身份两相对应。孙遇为当地郡守，苏大请其作序，以借其职官威望来推重此集之声誉，其意甚明，且理所当然，而孙氏与新安郡渊源颇深，据其自述“予由地官属，四知新安，凡十六年，土风民习，颇知其详。政务之暇，观民风，出郊垌，循行阡陌，虽穷乡僻壤，亦闻读书声。间有以文以诗来美予政者，予虽不能如诗文所美，其造意立例，语皆凿凿精实，从肺腑中流出”^①。其4次在新安为官，前后凡16年，对新安当地风俗十分详熟，且感情颇深，而当地文士以诗文进献而美其政者，也是对这位地方长官政绩的肯定和赞扬，所以他颇为自豪地言说此事；接着，他又提及宋代徽州籍大儒朱熹，并借之联系到新安经学大炽，列举本地先贤，以激励后学，称该地“仁义浹于民心，礼乐陶乎民性，气运日隆，风俗日美，文足以追乎六经，诗得雅颂之体，駸駸乎有三代之风矣”，借此申明景元刻此集的目的是“尊先哲，启后人”，对其有“无穷之望”^②。该序文风雅重自持，寓自豪期许于其中，颇为符合其当地郡守的贵重身份。

程富与汪敬思之文，共同关注到“选者尤难”的问题。程富家有《流芳集》，苏大曾为其订正，因此二人私交颇深，且其深知编选文集之难，叹“夫集录固难，订正尤难，天资有高下，学识有浅深，未必皆合，不滥取，不枉去，非出人头地者莫能”^③。其序作于其去世当年，程氏时年已70岁，因而发身心之感喟，曰：“每言吟诗，迩来稍稍步骤于唐，古文日趋日下，如老者不可复少，喟然长叹。”^④认为文运尤其是古文日趋于下，就像老者不可复少，颇有悲凉之感，是其暮年心态之流露。

而汪氏之跋则更为关注诗文本身，曰：“盖诗而似诗，文而似文，肖象矣，而犹我也；诗而诗，文而文，无形矣，而非我也，必如是而后始可言文。作者固难，选者尤难尔。入群玉之府，过冀北之群，眩目惑心，则鱼目夜光，骊黄牝牡混矣，况精义入神之事乎？”^⑤从诗文之辨体出发，自然引入“选”者比作者更难的论调，并批评当世有不知根底，随意批评苏大者，认为其抉择甚易，而不见其功力之深，见定之难，“世之好异者，徒论景元抉择之为易，而不知景元养深见定之为不难也”^⑥。以此来褒扬苏大重订之功。二人对“选者尤难”的认知，是基于该书乃二次重订的特殊性，由于目前金德珙原本已佚，我们无法通过对比得知苏大删汰者有哪些。作为一个“选而再选”的文集，其难度远大于初选文集，又因其地域性文集的性质，所选录与删汰之诗文作者与当地文人世家之间必然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因此招致被删汰者的不满，且其15卷之数远少于金氏原集40卷，重订者苏大在二次去取之间，更易招来时人尤其是被删除者之非议。

鲍宁后叙则极力盛赞新安之文风传统，自朱熹后振起于世，“阐天人性命之理，继往圣绝学，集诸儒大成，郁乎文风之盛，有东南邹鲁之称”^⑦，把朱熹祖籍的新安郡盛誉为“东南邹鲁”，抬高到与孔子其家乡相比肩的高度，并认为新安之文风各体兼备，“斯古之人所尚者，而新安之文，实兼备焉……古文之作，如序、记、书、传、论、赞、箴、铭及咏歌之辞，所以奖忠

① 孙遇：《新安文粹序》，苏大：《新安文粹》，第1页。

② 孙遇：《新安文粹序》，苏大：《新安文粹》，第3—4页。

③ 程富：《新安文粹序》，苏大：《新安文粹》，第5页。

④ 程富：《新安文粹序》，苏大：《新安文粹》，第5—6页。

⑤ 汪敬思：《文粹后跋》，苏大：《新安文粹》，页码损毁缺失。

⑥ 汪敬思：《文粹后跋》，苏大：《新安文粹》，页码损毁缺失。

⑦ 鲍宁：《文粹后叙》，苏大：《新安文粹》，页码损毁缺失。

孝、崇节义、明天理、正人心，诚有关于世教而不可缺，□□□□而集之者，故其传也不广焉”^①。鲍氏所理解的古文是包括诗歌的，认为这些诗文更具有“补世教”之现实功用。其身份意识还体现在对自己身为本郡之人，所肩负的弘扬本地文化的自觉意识和不可推卸的责任：“景元征予言，予邦人也，安敢辞？”^②乡邦之责，宗族之任，乃是其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意识。

苏大所撰之后序排列在最末，记载却最为详备。其于前代选集中最为推重者乃是萧统《昭明文选》与宋初姚铉之《唐文粹》，认为二者去取之间，能不为后人所议，已是难得。随后叙述《新安文粹》的编选缘由及成书过程，以及自编己之文集为1卷，附录于末的缘故，乃是因悲叹于生命短暂如朝露，读书一世，一旦身死，皆为虚枉，想借编选文集之机会，自传其诗文，算是对自己私心的一种解释。同时，也提到当时有人议论其取“多闲文义理之说”^③，收录不广，苏大则反驳之，认为精粹比广博更重要，先代有文人因一句而古今称赏者，义理之实，正气浑厚，才是文之根底，进而讥讽那些徒为议论而不做实际之功者，“是编不唯有裨郡录之缺，法古道，矫时弊，扶教善俗，亦一助云，其间收录不尽，去取不当，后之君子，恕其狂妄，删而正之，访而补之，又是集之光，无徒以议为也”^④。可见当时苏大对金德珙原集之删订力度颇大，删去时人之文，却又附录己之诗文，颇有私心之嫌，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满，因而招致非议。由此可见，苏大借此集之编刊保存流传自己的诗文作品，以垂名后世的主观意愿是非常明显的。不仅如此，其末尾还详细列出了捐资助力本集刊出者的姓名及各自所出之资费，并曰：“噫！吾郡多富家，助钱刊书，以光斯文者此耳，故识其名姓于后，与此书并传而无穷焉。”^⑤可见编选刊刻一部文集之不易，需要多人共同参与，资费在此时变得尤为重要，且借由文集之编刻也能给相关参与者带来“垂名”之益。编者更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以此来鼓励诱导当地富家文士参与刻书事业之中。

三 从《新安文粹》到《新安文献志》：文学生态链后出转精之典范

宋代大儒朱熹祖籍徽州府婺源县，自朱熹之后，徽州地区人物辈出，理学昌明，甚至形成盛极一时的“新安学派”^⑥，因而，记载新安郡当地人物风土、学理学脉之文献层出不穷，如明代程瞳为梳理新安地区学系源流所著的《新安学系录》，嘉靖年间由戴廷明、程尚宽等编撰的专门记载徽州地区宗族历史的《新安名族志》，赵滂所编记载程朱理学发展渊藪的《程朱阙里志》等。

程敏政之宗族程氏，世居休宁，累世重文，其本人幼称神童，及长大后，学识渊博，当世著名，所编《新安文献志》为专录徽州文献之地方总集，开创了以“文献志”的方式记录保存地域文献的体例，其后仿续者层出不穷，仿其体例者，如管一德《皇明常熟文献志》，记载保存常熟地域文献；续其选文者，如晚明程廷策《新安文献志续编》，补录弘治以后新安当地文献；又有罗斗、罗所蕴等编《浚川足征录》目次中即明言“仿《新安文献志》编”^⑦，杨慎辑《全蜀艺

① 鲍宁：《文粹后叙》，苏大：《新安文粹》，页码损毁缺失。

② 鲍宁：《文粹后叙》，苏大：《新安文粹》，页码损毁缺失。

③ 苏大：《新安文粹后序》，《新安文粹》，页码损毁缺失。

④ 苏大：《新安文粹后序》，《新安文粹》，页码损毁缺失。

⑤ 苏大：《新安文粹后序》，《新安文粹》，原本页码损毁缺失。

⑥ 参见周晓光《宋元明清时期的新安理学》，《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4期。

⑦ 参见罗斗、罗所蕴、罗大章：《浚川足征录》卷首，清绍衣堂抄本。

文志序》“用程篁墩新安之《文献志》例也”^①，即为典型例证。

《新安文献志》与后续受其影响仿、续所出之文献总集，从体例和内容看，流脉较为清晰，基于此书影响之大，编著者名声之盛，流传版本内容之完整，现今对其后续传承之研究不乏其人，而对其编纂之时受先前同一地域同类文集编撰之影响的探究则罕有涉及。其凡例中虽有言“乙集不分行状碑铭志传，止云行实，以朝代先后为次，仍遵西山《续文章正宗》例，略分门类，以便观览”^②，明确指出遵《续文章正宗》之体例。但程敏政编辑此书，大约亦受先出之《新安文粹》影响，基于我们先前所述《新安文粹》之序跋中所言，当时当地人对《新安文粹》重订过程中删汰过多，收录太少的议讥，很难说《新安文献志》之博收广备不是对《新安文粹》裁汰过多，收录太少的一种实际行动上的不满和抗议。其编选最初之缘故契机，及编选体例的改变，内容上求全责备之举，无不显示出对《新安文粹》之不满，以是编弥补先出者之缺失的痕迹。这一点程敏政在自序中也微有流露：“纪载之书，散出无统。有志于稽古尚贤者盖屡属意言，然或自秘而失于兵燹，或据所见而未之详略，读者不能无憾也。”^③其不满者一则记载当地文献之集散出，没有一定完备的成规体例可循，二则编辑者去取详略不当，使读者留有遗憾，又因周围有志于此之人屡屡进言，属意其编一个更为完善全备的版本，可见其编纂之初，即立志为后来者创制范式之意。

其言当时所闻编成后自我家藏，秘密保存，未有刻成传世，因战乱而遭焚烧损毁者，也很可能即指金德珵原编之《新安文集》。该本编成于景泰二年，编成前二年正统十四年（1449）发生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编成后一直家藏，未曾刊刻，逾六年，至景泰八年（1457），又发生了“夺门之变”，后改元天顺，在这前后十余年间，金氏年老家贫，无力自费刊刻，加上异族入侵，政权更迭，这在苏大之后序中亦有表露。即使其集并未如程敏政所言直接毁于兵祸，然时局动荡对社会整体刻书事业，尤其是私人刻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最终导致金德珵去世时仍无法刊布。程敏政又言当时所见而未之详略者，大约接续前者，指经苏大重订裁汰之后的《新安文粹》而言。因此，程敏政编辑《新安文献志》时，应未见金氏《新安文集》原本，而其所见者乃苏大重订之《新安文粹》，且对是集颇为不满。

《新安文粹》与《新安文献志》前后相续，单从体例上看，二书颇不相同，前者的体例划分比较传统，是诗文合刊本，以体分类，卷1至卷10包括记、序、书、跋、赞铭颂、论、传、行状、碑志、杂著，以及卷14的补遗，文共115篇；卷11至卷13，包括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诗歌共240首，文学性较强，选文以“精粹”为要。后者则更注重文献保存功能，以“博采全备”为主，收录文类360篇，诗词曲类1000多首，体量之巨，几乎是前者的三至五倍。

二者的共同之处，一是重朱子理学一脉，这也是由朱熹祖籍于此，由此带来的地域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所决定的；二是均于末尾共同详细记录了助刊者之姓名及捐资费用，可见编者对因刻书费用影响导致刊出之难的切身体悟，及对捐资者的感激。

《新安文献志》因体量过大，导致间有踬驳之处，如载“金仁本（德珵），休宁汪坑桥人，家贫嗜学，极力搜访先达遗书三十余种，又编《新安文集》十卷，及《道统源流》《程朱氏录》

① 参见杨慎：《四川通志·全蜀艺文志序》，《中华大典·文献目录典·文献学分典·目录总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1页。

②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凡例》，第2页。

③ 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序》，第2页。

《小四书音录》”^①，其言“《新安文集》十卷”者，与苏大《新安文粹后序》所言“《新安文集》四十卷”相抵牾，当为笔误所致。《四库总目提要》亦举出数例不当之处，且四库馆臣也已对其因卷帙浩繁所难免之外误有所提醒：“是书卷帙繁重，不能以稍有挂漏，遂掩其搜辑之功也。”^②更加肯定其保存文献全备之功。

四 《四库总目提要》著录《新安文粹》之模糊与舛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有《新安文粹》15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新安文粹》，明金德玕撰。苏大重订正之。其第十五卷则苏大自载其诗文也。德玕字仁本，大字景元，皆休宁人。此书成于景泰、天顺间。程敏政《新安文献志》成于弘治初。《文献志》载此书之目于事略。此书补遗之内亦出敏政名，则二书同时所作，略有先后耳。中间所录之文，不及《文献志》之博，而颇有《文献志》所不载者。二书固互相表里也。^③

其表述语焉不详，颇有模糊而引人误解之处，主要有三点：

其一，此书成于景泰、天顺间。对《新安文粹》的成书时间范围之界定过于粗略宽泛，四库馆臣之言大略是从金德玕《新安文集》于景泰年间编成始，至苏大重订刊刻止，其跨景泰、天顺二朝，由上考证可知此书当于天顺四年冬付梓克成，“此书成于景泰、天顺间”过于模糊，应为此书编于景泰、天顺间，刻成于天顺四年冬。

其二，《新安文献志》成于弘治初。此说亦非十分严密，目前学界已有研究者对《新安文献志》的成书编刻始末作了详细考证^④，认为其编集大约始于天顺四年前后，也就是《新安文粹》刻成之年，历时三十余载，成书于弘治三年（1490），又经七载，刻成于弘治十年。四库馆臣言“成于弘治初”，若以此书编成时间而言，是合理的，但若以刻成之年算，当成于弘治中期。

其三，言二书同时所作，略有先后。据以上分析，二书乃先后而成，绝非“同时所作”。四库馆臣的理由是《新安文献志》载有关于《新安文粹》的记载，其《新安文献先贤事略上》有金德玕和苏大的生平事略，以及对《新安文粹》的记载，这是可查证的。但又说《新安文粹》卷14“补遗”中出现程敏政的名字，先不论即使出现程敏政之名，也无法据此肯定二者同时所作，又遍查《新安文粹》卷14“补遗”，并无“程敏政”之名，包括其字、号，一并皆无。二书当是先后所作，后者受前者之影响，因《新安文献志》卷95下有《金仁本（德玕）传》，与《新安文粹》第15卷中的《金德玕传》除题目略有差异外，其内容几乎一字不差，当是转录，而非原创。

另外，《新安文献志》100卷之多，其收录之博，自然远在《新安文粹》之上，而《新安文粹》有《新安文献志》不载者，也是自然之事，四库馆臣言二书“互相表里”，是恰切的。

结语：地域文学生态链生成演进典型个案之启示

作为新安郡的地域性文献总集，从金德玕原编《新安文集》40卷，由于受时局及自身因素

① 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上）》，第27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第2642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2679页。

④ 参见吴有祥：《〈新安文献志〉编刻始末考》，《黄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的综合影响，未刊而卒；到其侄苏大裁汰重订，并汇集自己的诗文创作为1卷，附录于末，更名为《新安文粹》15卷；再到程敏政《新安文献志》的编辑刊刻，金氏前后历时30余年，苏大历时近10年，程敏政又历时30余年，3人皆致力于新安郡之文集典藏的搜集保存，其历时之久，编刻之难，皆有功于当地。

《新安文粹》作为中间环节，在客观上无意中起到前后勾连，顺承上下之功能，其编纂成书过程具有典型意义，在多个方面能给我们以启迪，诸如：文献总集编选时间之久，刻成之难；“选而再选”的二次选拔特殊性带来的序跋者“（再）选者尤难”的体悟；刊刻过程中重选者删汰过多，且附己之文集随刊的“私心”引发的时人之议论不满；因资费问题对助刊者的感激，并以集末汇编附录捐资者姓名、费用的方式，甚至用夸大之言，以可借此书编刻垂名之语诱导鼓励周围人参与到刻书事业中的权宜策略。《新安文粹》以精粹为要，裁汰过多，引人物议的不满之处，更是在客观上成了程敏政立志编刻更为全备的《新安文献志》的契机。

从金德珙《新安文集》始编，到苏大重订为《新安文粹》，再至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刻成，前后共约70余年的时间，三者自然生成了一条线索脉络明白清晰的地域性文学生态链，见证了地域性文集编纂的逐渐成熟完备过程，在地域性文集的编选刊刻方面极具典型意义。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輿地纪胜》点校献疑一则

《輿地纪胜》卷37《扬州·碑记》：“《大观九域志》，刘彦序。”（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59页）其《校勘记》〔一二七〕云：“刘彦：《校勘记》卷八：‘张氏鉴云：《九域志》非专记扬州，疑有误，按宋刘彦惇曾著《扬州图经》，‘九域’疑‘扬州’之误。但言刘彦者，以‘惇’字系光宗讳耳。”按：此为误校。宋徽宗崇宁年间诏修全国地理总志《九域图志》，也称《九域志》。为保证其书顺利撰修，曾令各地先行修撰本地地志献于朝廷，时各地所修地志均称为《九域（图）志》。如乾道《四明图经》卷1载有“大观之初，本州所编《九域志》乃引《淮南子》所谓……”语（“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4879页），知大观初四明曾修本地方志《九域志》一部。再如葛胜仲言其“兄在京东，进《九域图志》，为诸路之冠，特进秩一等”〔《丹阳集》卷21《先兄中散挽歌词四首（其二）》注文，“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第32册，第709页〕。知其兄曾撰修《九域图志》，上于九域图志局。又考《中散兄诗集序》言及其兄“掾琅琊日，尝考究其州山川、地理、古迹、姓氏应典籍者，为书上于九域图志局，精深详博，为天下第一，首膺进秩之宠”。文中所言“琅琊”为郡名，北宋时指沂州，知葛胜仲之兄葛和仲曾撰修《九域图志》为京东路沂州之地方志，非全国总志（《丹阳集》卷8《中散兄诗集序》，第579页）。由此可窥得宋徽宗崇宁以来各地修撰图经、地志进献朝廷，以备《九域图志》编修，其书内容虽仅为各地地方志，然多以《九域（图）志》称之。有鉴于此，《輿地纪胜》卷37《扬州·碑记》所指为大观年间扬州本地编修《九域志》，非记载有误。

（石悦）